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第三辑

朱进国 著

唐宋元明清书信选析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元明清书信选析 / 朱进国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4.11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 / 李星主编. 第3辑)
ISBN 978-7-5525-1598-5

I. ①唐… II. ①朱… III. ①书信集—中国—古代
IV. ①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9303号

唐宋元明清书信选析

朱进国 著

责任编辑 靳红慧 段继科

封面设计 石磊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36103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飞马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0144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1598-5/I·475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唐宋元明清书信选析》（以下简称《选析》）是对唐至清朝的优秀书信的选编与赏析。在选编与赏析时，尽量兼顾到内容及艺术，尽力展示这一阶段的人文与历史、政治与创作。从内容上而言，这本《选析》大致分为爱国、干谒、议政、论学、创作、亲情、友情等。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人的书信相比，这些书信中没有了随心所欲，任意宣泄；没有了人的个体意识的唤醒，个性自由意识的焕发；少见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发自内心的真情流动；至于担心忧虑、想念伤悼、瞬间感悟、豪情壮志、抒发抱负、无可奈何等等情绪情怀在唐宋以后的文人书信中更是凤毛麟角。魏晋南北朝致友人之书信中，抒情写志中流淌着一股深厚真挚的友情，这种友情完全是本着秉意相投、志趣相合的原则，完全是出自人的一种本真心性，绝无丝毫杂质与污秽，那种以利相交、以贵相交、以权相交的现象根本没有，但在唐宋及以后文人书信中则夹杂着这种现象。至于把书信当做表现个人艺术修养、文学功力，苦心设计与营造，使形式与情感俱佳，骈散并用，声律委婉和谐，典故运用，辞藻雅丽等则是如出一辙。或泼墨如水，洋洋万言，如司马光《与王介甫书》、苏轼《上神宗皇帝书》皆如此；或惜墨如金，妙趣横生，如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是也。这些书信的艺术表现形式我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赏析》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里就其内容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方便尊敬的读者

阅读。

为什么从唐宋及以后就缺少个体意识、个性自由意识的焕发，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重家庭轻个人的现象，正如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言：“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庭观念上筑起。”这话虽欠全面，但也较为准确。在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里，个人是不被重视的，个人的荣辱也是不被重视的，必要时，个人可以为家庭牺牲自己。家族需要荣耀，你就要为它贡献才智；家族需要维持门风，无论如何恶劣的婚姻，你都不能分离。家族为了维护表面的和平家风，每一个组成分子，必须敛抑自己的个性，不可伸张。在家族的生活中，人几乎从未被个别地了解过，人都生活在各种关系的限制中，不是君，便是臣；不是父，便是子；不是妻，便是夫。在这种关系的限制中，并不包涵平等关系，而是上下级隶属关系。臣为君所有，子女为父母所有，妻子是丈夫的玩物。当这种文化长期潜移默化后，人的个性就慢慢淡化。忠孝情结、济世思想、为人处世、治学仕途之道，在书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李白《与韩荆州书》、欧阳修《与高司谏书》、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曾巩《寄欧阳舍人书》、曾国藩家书等，这些书信看不到个性的张扬，即便是有，也是经过儒家文化浸染的，绝不像魏晋书信。

在此大文化的背景下，自唐及唐以后书信在内容上基本呈现爱国、干谒、议政、论学、创作、亲情、友情等。

羞羞答答事干谒。提起干谒，我们应该最先想到的是唐代诗人孟浩然，苦学多年，进京赶考，名落孙山。他给丞相张九龄写了一首五言律诗《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期求得到援引推荐：“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诗歌委婉地表达了希望为朝廷干一番事业的急切心情。

还有唐代诗人朱庆馀，在临考前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近试上张水部》探听虚实：“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诗借新婚之后的脉脉情事，把

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媳妇，把张水部比喻成舅姑（公婆），探听虚实。比喻通俗贴切，别出心裁。张籍看过，大为赏识，回诗一首《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诗歌仍以比喻作答，把朱庆馀比作“越女”，把他的诗比作“菱歌”，用“一曲菱歌敌万金”表明对其才华的赏识。

干谒之风盛行于盛唐（特别是玄宗开元年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盛唐时期，干谒大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前辈或时辈因干谒而获成功的范例是刺激盛唐干谒兴盛最直接的因素；其次，盛唐的各项取士授官制度诸如科举、铨选、入幕制度等促使士人从获得省试资格起到正式入仕为官之后，终其一生都必须不断地干谒；再次，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人的个体意识、功名意识被充分地激发了出来，强烈的功名意识是盛唐干谒风行的重要原因。

盛唐时期因干谒而登第、拜官，“一鸣惊人”的成功例子是很多的，这样一种现象无疑具有“榜样”的示范作用，引诱更多的人投入干谒大军之中。尹愔“博学，尤通《老子》书。初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荐愔者，召对，喜甚，厚礼之，拜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修国史”（《新唐书·尹愔传》）。李邕因内史李峤及御史张廷珪之荐，召拜左拾遗（《旧唐书·李邕传》）。王维因岐王之爱重、九公主的举荐而于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擢右拾遗，迁给事中。高适秉承“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高适《行路难》（其二））的观念，干谒宋州刺史张九皋，张九皋奇之，遂推荐给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高中有道科。

干谒之所以能成功，在于这种方式切合唐代采取“考试为主，荐举为辅”的选官政策。朝廷曾下诏要求各级官吏荐举能人异士，而怀才不遇之士若无人举荐，亦可自举，“凡宰相王臣，宜加搜择。其常参官及郡县长史上佐等，皆从历试而践通荣，如各知其密行异能、博学深识、才堪济代、术可利人、名不彰闻、位不充量、湮沦屠钓、流落风波者，一善可录，便宜公举。远则裁表附驿，近则进状奏闻，勿避亲雠，无限侪伍。其有独负奇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匭（簠的古字，朝廷接受臣民

投书的匣子），并据陈状自论，长官登时与奏。夫惟荐士，非止一举，永为恒典，有即登闻”（贾至《诏天下搜贤俊制》）。对被干谒者而言，接见并引荐其中的佼佼者入仕既符合朝廷求贤、礼贤的一贯政策，又能扩大个人的声名、影响力，干谒这种行为对于干谒者和被干谒者实在是双赢的好事。正如韩愈《与于襄阳书》中所言：“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先考试后举送。考试的内容有两项：其一，才艺，“自乡升县，县升州，州升府，皆历试才艺”（李奕《登科记序》）。其二，品德。对于两者的考察弹性较大，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大都依据相关人士的个人喜好。加之“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虽“有才能者无常数”^①，竞争亦相当激烈。因此，举子不得不“借援于左右，求容于摈介……俯仰权贵之门，逶迤富利之室”（李翰《难进论》），县、州、府的各级官员就成为主要的干谒对象，如陈子昂的《上薛令文章启》、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等。如苏源明《自举表》：“伏奉今年正月五日制，诣阙自举……县令臣柳国状臣于编户之中，刺史臣柳绛谕臣以明制之意。”自举为那些干谒无门者入仕开辟了一条道路，从而使更多的贤良忠直和绝学特艺之士有机会一展所长。但是，他荐较之自荐的应试举人中举的机会大得多，这样的现状促使举人们汲汲于干谒。

唐人求官的方式除参加科举外，还有投匭和献书两种途径。投匭和献书虽以皇帝为干谒对象，但仍需要有人引荐。士人欲成干谒皇帝之事，就必须打通关节。比如杜甫在投匭进献《三大礼赋》、《雕赋》、《封西岳赋》的同时就曾请托献纳使田澄为其引荐，有《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为证。综上可见，无论哪种进身方式都需干谒。而文人对州府长史的干谒文较多，如李峤《上雍州高长史书》、《上高长史述

^①杜佑·通典·选举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83

和诗启》等。此待选之人不得不四处干谒，以求声名达于主司，以尽快重新任职。也有人在贬黜后，为求升迁而四处干谒，如张楚的《与达奚侍郎书》请旧友达奚珣念及故旧之情，帮助其调任“高班要津”。

盛唐文人怀着求仕的勇气和信心，汲汲于功名，但能青云直上、封侯拜相的幸运儿毕竟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或年已老大而未能及第，或虽登堂而未能入室、沉沦下僚，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消沉，秉着枉尺直寻的观念，四处干谒，坚信“终当拂羽翰，轻举随鸿鹄”（高适《酬鸿胪裴主簿雨后北楼见赠》）。李白《与韩荆州书》、韩愈《与于襄阳书》、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其实干谒诗文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一些文人为了求得晋升的机会，往往十分含蓄地写一些干谒诗文，曲折地表露自己的心迹。

我国是一个不喜张扬、崇尚含蓄的国度。很看重面子，自己有才能，但不能显露，得“藏在深山待人识”，得“千呼万唤始出来”。侯嬴在信陵君几次盛邀之下勉强应邀，诸葛亮在刘备三请之后方才出山。

“（弟道约）好以荣利干谒，乞丐不已，多为人所笑弄。”（《北史·酈道元传》）“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欧阳修《论举馆阁札子》：“士子奔竞者多，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蒲松龄《聊斋志异·神女》：“虽属大僚通家，而未尝有所干谒。”朱执信《序言》：“三十年来，社会革命家时有干谒卿相与坚相结纳者，是非诚与之，其策略有不得不然者。”

济世为民的议政。中国最早的议政，应该是相传的尧帝设立的谤木，通常树立于各个交通要道，假如你生活在尧帝时代，又对尧帝的治理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那么你就可以到大路交衢找一根谤木，将你的意见与建议刻上去——那时候还未发明纸，书面意见只能靠刀子刻在木头上。谤木上的意见，官方会定期收集起来，送到政府那里，供政府的公共决策参考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华表，在远古时期不是一种装饰性的建筑物，而是代表了一种古典的民主议政机制。因此，华表又叫做“谤木”、“诽谤之木”。古人所说的“诽谤”，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

解的那个意思，如果要翻译成现代汉语，旧时“诽谤”就相当于今人说的“参政议政”。后来秦王统一天下，将谤木废除了，后来谤木逐渐演变成了华表，将木头改为石柱，越做越华丽，成了装饰性的建筑。

宋朝时，华表的实用功能已经消失，不过宋朝人建立了一套更加完善的“民主参政”机制。宋政府在各个州县乃至乡镇，都设有“粉壁”，用来张贴政府公告。每当政府要启动立法的时候，就在各州县的粉壁贴出公告，征集立法建议。明末据说在徐州沛县一带，“邑有大事，士子皆得与议”、“得与荐绅、先达、里父老商榷持衡”的惯例。晚清之时，随着西方政治思潮的传入，近代式的民主政治终于在中国大地上试水——清廷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操演机构；在地方设立咨议局，作为地方议会的操演机构。

作为文人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他们的参政议政方式多为疏、策、书等。《战国策》的《苏秦始将连横（秦策一）》，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等等，均可看做是参政议政的好文章。当然作为书信，发展到唐及以后，书信的参政议政就比较讲究，和秦汉魏晋比较，其相同点都是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目标明确，一事一议。李斯的《谏逐客书》只议逐客事，司马相如《谏上猎书》就规劝皇帝不要狩猎。司马光《与王介甫书》就专题讨论“变法”，宗臣的《报刘一文书》就论述“上下相孚，才德称位”之问题，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批驳司马光来信中谈的问题。但表现艺术还是有区别的。李斯、司马相如劝谏只谈皇帝的统一大业和皇帝的安危，角度新颖，言词恳切委婉，曲径通幽；而唐及以后书信，虽有对前人的艺术借鉴，但往往单刀直入，言词较为犀利，如宗臣、王安石就是入木三分。

谦虚谨慎的治学。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过，“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在于旁征博引”，论据充分。于光远说，“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在于咬文嚼字”，概念清楚。看看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包括曾国藩的家书中谈到的治学，我们必须要把放在特定的

环境中去解读，有些观点至今读来受益匪浅。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对后学者的毫无保留、推心置腹以及严谨的态度。

至于忠孝情结如夏完淳《狱中上母书》，更是感人至深，浩气回荡。林觉民《与妻诀别书》，情真意切，字字泣血，到处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真情，缠绵悱恻而又充满激情，充满凛然正气。为国捐躯的激情与对爱妻的深情两相交融、相互辉映，叫人断肠落泪，而又撼人魂魄、令人感奋。曾国藩的家书，家常琐事见真情，论学为人启后生。

所选书信内容：有近魏晋风范寄情山水、托物言志的；有干谒求仕途、犹抱琵琶的；有为师论治学、推心置腹的；有关乎国计民生、慷慨激昂的；有尽忠而舍孝的；有为国献身抛弃爱妻的；有事无巨细、娓娓道来的。诗言志，书信比诗更言志；词寄情，书信比词更深情！

2014年6月30日深夜

前 言

在学校特色发展、内涵发展、科学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提升教育质量的跨越式发展之际，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终于破壳问世了。

为了呈现近40年来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推进学术繁荣，让宁夏师范学院这所年轻的本科院校师生的学术结晶有展示的平台，“学人文库”的付梓出版，必将是一件福荫后学的事业。

“学人文库”的著作与宁夏师范学院近40年的历史相比，还是一个“新生儿”，但是有了这个开始，她会在阳光、风雨中成长、进步。我们相信，有前辈学者的筚路蓝缕，又有“后学”的薪火相传，诸多的学术积累定然会在漫长岁月中留下回响。值此之始，我们期望更多的学人以此为契机，潜心研究，锐意创造，积学、向学，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智慧成果。

“清水河畔静读书，六盘山下育英才”。宁夏师范学院得清水河之涓秀，六盘山之伟豪，虽然僻远贫闭，但有了宁夏师范学院一批批“学人”智慧的烛照，固原——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必将焕发新的文化内涵。

“学人文库”会本着开放的视野，以系列丛书的形式融汇宁夏师范学院学人研究成果中的华彩乐章。无论以时间为序，还是按学科分类，或者依专业建类，我们需要呈现的就是术业有专攻的各类文风，彰显“宁师学苑”的片片风景。

学人文库编委会



目 录

答刺史杜之松书	唐·王绩 / 1
与韩荆州书	唐·李白 / 9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唐·王维 / 19
答李翊书	唐·韩愈 / 23
与于襄阳书	唐·韩愈 / 35
与友人论为文书	唐·柳宗元 / 39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唐·柳宗元 / 46
与高司谏书	宋·欧阳修 / 53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宋·苏洵 / 62
寄欧阳舍人书	宋·曾巩 / 71
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 / 79
与王介甫书	宋·司马光 / 89
上神宗皇帝书	宋·苏轼 / 106
与章子厚书	宋·苏轼 / 122
上枢密韩太尉书	宋·苏辙 / 128

戊午上高宗封事	宋·胡铨 / 134
驳何氏论文书	明·李梦阳 / 144
报刘一丈书	明·宗臣 / 163
与丘长儒书	明·袁宏道 / 176
与友人论学书	明·顾炎武 / 180
狱中上母书	明·夏完淳 / 188
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	清·郑板桥 / 196
曾国藩家书选五	清·曾国藩 / 201
与妻书	清·林觉民 / 219
参考文献 / 228	
后 记 / 231	

答刺史杜之松书

唐·王绩

月日。博士陈龁至，奉处分，借《家礼》，并帙（zhì）封送，至，请领也。又承欲相招讲《礼》，闻命惊笑，不能已已。岂明公前眷，或徒与下走相知不熟也？

下走意疏体放，性有由然，兼弃俗遗名，为日已久。渊明对酒，非复礼义能拘。叔夜携琴，惟以烟霞自适。登山临水，邈矣忘归。谈虚语玄，忽焉终夜。僻居南渚，时来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乡间以狂生见待。歌《去来》之作，不觉情亲；咏《招隐》之诗，惟忧句尽。帷天席地，友月交风。新年则柏叶为樽，仲秋则菊花盈把。罗含宅内，自有幽兰数丛；孙绰庭前，空对长松一树。高吟朗啸，挈（qiè）榼（kē）携壶，直与同志者为群，不知老之将至。

欲令复整理簪屨（jù），修束精神，揖让邦君之门，低昂刺史之坐，远谈糟粕，近弃醇醪（láo），必不能矣。亦将恐为狗貽梦，栢（h）社见嘲。去矣君侯！无落吾事。王君白。

（选自《唐宋散文导读》，熊礼平、闵泽平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译文】

月日，博士陈龁到来，奉您的吩咐，要借《家礼》，我已包裹送

上，陈奂回来，请收阅。另外，又承蒙厚爱邀我讲《礼》，听到十分可笑，情不自禁。难道长官及你的同事对我还不了解？

我随心所欲，自由涣散，又鄙睨世俗，厌恶名利，为时已久。陶渊明饮酒，不是礼仪所能拘束的。（《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归隐后，刺史王弘亲至其家，陶称病不见，后知陶往庐山，遣故人庞通在半路设酒，王弘乘机相见。）嵇康善于弹琴，本与山水云雾为伴。游山玩水，流连忘返。纵论玄机，不知夜至。隐居南渚，偶来北山，兄弟不用常礼和他相见，邻里以为是狂妄之徒。吟诵《归去来兮》满口余香，歌唱《招隐》之诗，唯恐读完。天做被子地做床，以明月为朋友，与山风相唱和。新年品尝用柏树叶子炮制的美酒，仲秋菊花盈把自有佳人送酒醉饮。罗含退休还家，庭院中突然兰菊丛生，（人们认为是他德高感化的结果。）孙绰在家门前，常常深情望树。（孙绰，字兴公，晋朝诗人。《晋书·孙绰传》载：“绰字兴公，所居斋前，种一株体松，恒自守护。”）高声吟诵，大声啸咏。提着酒具，拿着酒盅，和志同道合者为伴，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年纪大了。

您现在叫我重新整理头发和鞋子，约束控制我的精神，作揖谦让在官员的门前，附身低眉刺史坐前，去谈论远古的糟粕，放弃眼前的美酒，我肯定是办不到的。我担心我将成为刍狗，见笑于神灵（刍狗：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祭祀完毕即被抛弃。栢社：神社旁的栢树。《庄子·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乎曲辕，见栢社树，曰散木也。匠石归，栢社见梦曰：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栢，读作“立”。）。您就不必等候，不要靠我。王绩告知。

【注释】

杜之松，隋起居舍人。生卒年不详，约唐高祖武德元年前后在世。仕隋为起居舍人。贞观中，为河中刺史，请绩讲礼，答曰：“吾不能揖让邦君门，谈糟粕，弃醇醪也。”之松岁时赠以酒脯。尝答王绩书云：康成道重，不许太守称官；老莱家居，羞与诸侯为伍。仆岂不能正平公

之坐，敬养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师子夏。其雅尚可知矣。著有文集十卷，（《两唐书志》）传于世。

【赏析：流畅清新 隐逸情怀】

这封信应该写于贞观年间，当时王绩曾为太乐丞，不久归隐绛州龙门故里。当时杜之松、崔善继为其州刺史，慕绩之名，相邀见面。王绩均婉言拒绝。杜之松、崔善继不敢强求，只好岁末馈赠美酒鹿脯，诗书往来不绝（吕才《东皋子集序》）。此信是为拒绝杜之松邀他讲《礼》而作，它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孤高傲世的品格个性和弃俗遗名的生活态度。信一开始袒露狂态：听说杜之松请他讲礼法，“闻命惊笑，不能已已”。接着陈述了自己“意疏体放”、“弃俗遗名”的旷怀以及对“揖让邦君之门，低昂刺史之坐”的反感。此信以流畅清新的骈体形式书写了他的隐逸情怀，委婉之中暗藏刚劲。以素淡冷峻的文字活脱脱地勾画出了一个“狂生”的形象。

王绩的文，正如他的诗开唐一代气象，那种“郁郁之忧思”中，“想济世又不逢时，想旷达又无法超脱”的矛盾心态，与古隐士共有的“异代同心式”的精神气质和人生追求，一目了然。这种重内在情韵上的个性体现、表达真理想真性情的创作思想，与初唐以来“悠悠闲人”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会赋咏之作，是迥异的，颇有魏晋南北朝的文风特点。

文至初唐，历经了一个拨开前朝靡丽文风而开唐一代气象的艰辛历程。正如马积高在《赋史》中所述：“这时期的文学基本上还承袭齐梁的余风，但已在酝酿改革，出现了提倡汉魏风骨或气骨的新思潮”，“一些较优秀的作者已力求克服齐梁靡丽之习，而增加清新质朴的色调和刚劲有力的气势”^①。王绩和“初唐四杰”就是开唐一代气象的杰出代表。

^①马积高. 赋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早于“初唐四杰”50余年的王绩（王绩是王勃的叔祖父），在诗赋上早就“能洗尽铅华，独存体质”（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五）“高情气胜，独步当时”（《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闻一多称赞王绩是“洁己高标之士”，说“洁己高标之士，尤指不胜屈，此唐诗之一大特质也，而其开风气之先者，则自王君始”。“王君”诗开唐一代“风气之先”，文亦是如此。“四杰”作品中深重的命运感叹、达观自适的超越情怀，于王绩诗文中都能寻绎到相似的情志。王绩引起学人关注的是“三仕三隐”和诗歌方面的成就，至于王绩文的成就，目前能看到的是韩理洲在《王无功文集》序中的一句评价：王绩的“文赋，是陈子昂‘疏朴近古’之文的萌蘖”。

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铺采摘文，体物言志”。从铺叙华采、直陈文辞、体察物情、抒写心志的声调中，我们能更直接地寻绎到他的意识行迹、思想情志、语言风格、艺术观照方式等等。当时隋代著名文士薛道衡读完王绩十五岁创作的《登龙门忆禹赋》后，评价王绩“今之庾信也！”“今之庾信”的赞誉足见王绩在年少时才赋出众。

细读《答刺史杜之松书》：“下走意疏体放，性有由然，兼弃俗遗名，为日已久。渊明对酒，非复礼义能拘。叔夜携琴，惟以烟霞自适。登山临水，邈矣忘归。谈虚语玄，忽焉终夜。僻居南渚，时来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乡间以狂生见待。歌《去来》之作，不觉情亲；咏《招隐》之诗，惟忧句尽。帷天席地，友月交风。新年则柏叶为樽，仲秋则菊花盈把。罗含宅内，自有幽兰数丛；孙绰庭前，空对长松一树。高吟朗啸，挈榼携壶，直与同志者为群，不知老之将至。”通篇辞藻华丽，形容尽致，音韵流畅，与庾信早期《春赋》文风相似，秀丽中见谐整。这种文风与王绩“弱冠之时”“藉甚群公之间”“为知音者所赏”的经历有关。恰如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文变染乎世情”，也就在大业末，“君笃于酒德，颇妨职务，时天下乱，藩部法严，屡被勘劾。君叹曰：‘罗网高悬，去将安所。’”这番感叹在武德期间写的《燕赋》中也能读到：“网罗是避，鹰鹯是防”，完全是避害全身的思想，已绝不是写《三日赋》时那种面